

怒江傈僳族内地会

研究

申晓虎◎著

高校学术经典文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怒江傈僳族内地会 研究

申晓虎◎著

高校学术经典文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怒江傈僳族内地会研究 / 申晓虎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12 - 6248 - 6

I. ①怒… II. ①申… III. ①基督教—传教事业—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2730 号

怒江傈僳族内地会研究

著 者: 申晓虎

责任编辑: 钟祥瑜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 张明明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79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6248 - 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近年来，关于基督教在云、贵、川一带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当中活动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西南地区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众多，有的民族当中基督教信徒占全民族总人数的比例较高。此外，由于处在边疆地区，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问题纠结在一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重大，故此这一地区成为基督教研究的热点。本书将以怒江流域傈僳族为例，探讨中国内地会在傈僳族当中的活动历史与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的影响。

一

由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以下简称内地会）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西南地区，至20世纪50年代退出中国大陆，期间它的影响扩散至云、贵、川地区苗、彝、藏、傈僳、拉祜、景颇等少数民族。内地会在华宣教的过程中，以福音传播为主要目的，采取巡回布道的方式，注重培养本土传道人，积极推动本色教会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形成福音传播走“下层路线”的特点。该会在华传教的近百年时间中，活动范围几乎涉及中国各个省份，接触民众数量众多，传播速度迅速，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其他基督教差会。当下许多民族地区的教会或多或少都与内地会之前的活动存在渊源关系。另外，内地会在西南民族地区活动之时，正值中国国家政权整合，现代国家建构，中央与边疆加强联系之际，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内地会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影响综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边疆地

区较为独特的基督教发展历史，而其中尤以云南傈僳族教会的创立与发展引人关注。

傈僳族聚居在云南滇缅边境怒江流域，作为中国较早接触内地会的少数民族，傈僳族教会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内地会在少数民族当中活动历史的一个范本。以傅能仁（J. O. Fraser）为代表的内地会传教士于20世纪初进入云南活动，由于当地汉人对基督教回应寥寥，而傈僳族多对基督教持欢迎态度，故传教士将重点转向傈僳族。传教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立傈僳族拼音文字，通过翻译圣经，传授文字，发展信徒。同时，由于人手不足，活动地域广阔，传教士大力培养傈僳族本土传道人，借助他们接触民众，传播宗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内地会坚持本色化原则，积极推动教会的“自传、自养、自治”，促进了本色教会的发展。基督教在傈僳族中的传播历史，傈僳族本色教会的建立与发展，基督教文化对傈僳族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傈僳族教会的现状与前景，如何与社会相适应，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

二

对于基督教在包括傈僳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从国内来看自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一批学者，如秦和平、韩军学、钱宁等，先后出版了不少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学者们多是从历史学、宗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韩军学教授写作《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宏观地介绍了包括内地会在内的基督教差会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历史，其中对基督教在傈僳族中的传播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分析。钱宁教授将“边疆社会”和“短缺社会”相结合，用以解释包括傈僳族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的信教原因。秦和平教授在《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播史》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利用族群理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不同少数民族信教的情况。四川大学宗教所的陈建明教授近年来从文字事工的角度出发，在《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翻译出版考述》（《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与《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创制活动》（《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中考察分析了基督教文字事工对包括傈僳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影

响。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斌教授在《圣经翻译、文字创制与社会转型——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接受为例》中，运用人类学以及田野调查的方式，分析了傈僳族文字创制具有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影响。

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与博士、硕士研究生对傈僳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张兴洪、张慧星在《云南怒江傈僳族基督教信仰调查》中，考察了80年代末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现状，并作了简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卢荣和博士在《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的田野研究——以云南怒江傈僳族为例》的博士论文中，对当代傈僳族教会、信徒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对傈僳族的信仰现状进行了分析。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曹月如在《云南怒江傈僳族基督教文化研究——以福贡县架科乡里吾底村为例》的博士论文中，以民族学的理论入手，重点考察了基督教文化对傈僳族的影响。四川大学宗教所王再兴博士的毕业论文《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中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圣经翻译，其中涉及傈僳文《圣经》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卢成仁博士从体味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基督教在怒江上帕娃底村的传播进程，重点考察了80年代以来当地基督教的发展状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云南大学的付伟斌在硕士论文《怒江傈僳族基督教传播研究——以怒江州泸水县大兴地乡灯笼坝村为例》中，以一个村落为考察单位，对基督教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中国香港的研究来看，涉及这方面研究的有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相关成果有杨学政、邢福增主编的《云南基督教传播及现状调查研究》、蔡锦图的《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等等。另外香港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内地会传教士的回忆录及书籍，比如《山雨——傅能仁新传》《深渊上的居家》《我成了一台戏》（杨宓贵灵）、《同行二里路》，以及狄克（Dick, Lois Hoadley）的《傈僳女使徒》。

国外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尤其是对傈僳族教会的研究，由于受种种原因限制目前并不多见，大多是关于内地会本身在华活动情况的研究，例如 A. J.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David An-

thony Huntley, *The Withdrawal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from China*.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内地会在傈僳族中传教活动的研究仅有 Walter Leslie McConnell III 于维真学院写作的硕士论文: *J. O. Fraser and Church Growth Among the Lisu of Southwest China*. 作者在文中简要介绍了内地会在傈僳族当中的传播历史,也分析了基督教对傈僳族产生影响,但其重点是关注傅能仁的活动及其影响,缺乏对内地会其他传教士的研究。另外柯饶富(Ralph Covell)在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一书中对于基督教在中国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传教进行了总结,从传教学的角度审视了基督教对包括傈僳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响。

三

本书通过文本和实证研究,运用宗教学、历史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将文献分析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力图全面剖析内地会在云南怒江傈僳族当中的传教活动,傈僳族教会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产生的影响。

本书使用的资料包括两部分,文本材料和田野考察笔记。前者包括地方档案资料、历史典籍、方志、地方文史资料、传教士和信徒的回忆录等等,后者系笔者前往怒江教会考察记录的文字、录音录像等一手资料。

(一) 文本资料

1. 地方档案资料,包括各级档案馆对内地会在怒江活动的记载。

2. 地方文史资料与傈僳族历史调查材料,包括《云南文史资料》《怒江文史资料》《泸水县文史资料》《福贡县文史资料》《滇西基督教史》(朱发德编)以及50年代与80年代的傈僳族调查材料等,含有关于内地会在傈僳族当中活动的情况记载,信徒回忆录等珍贵资料。

3. 传教士传记与回忆录。这部分内容以英文资料为主,涉及傅能仁、杨思慧、杨志英等重要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例如 *Behind the Ranges*, *Mountain Rain*, *Fish Four and the Lisu New Testament*, *Nest Above the Abyss*, *In the Arena*, *By Searching, One Vision Only*, *precious things of the lasting hills*, *Stone of Fire*, *Each to Her Post*, *the prayer of faith*, *A Flame of Sacred Love*,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Bible in China*, *Beyond the Clouds*, *Green Leaf*, *Ascent to tribes* 等等,叙述

了传教士在傈僳族当中的传教活动以及他们对教会发展的观察与解读。

4. 内地会刊物。China's Millions (《亿万华民》) 伦敦版和北美版, 其中记载了大量涉及怒江傈僳族教会文章, 包括传教士活动、教会发展、信徒人数增长等等内容。

5. 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国内外对内地会的研究论文, 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研究论著, 当代傈僳族教会的调查报告等。如80年代张兴洪、张慧星对怒江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调查, 2000年云南大学跨世纪民族调查对上江乡百花岭村的考察(《傈僳族—泸水上江乡百花岭村》), 以及近年来韩军学、高志英等教授对包括傈僳族在内的跨境民族现状调查(《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等等。英文资料包括 J. O. Fraser and Church Growth Among the Lisu of Southwest China,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等等。

(二) 田野考察

2010年7月笔者前往怒江泸水、福贡、贡山进行田野考察, 访问了当地教会与信徒, 采访收集的文字、音像资料。

四

国内外对内地会的研究, 多集中于戴德生的传教活动, 目前还没有全面论述内地会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活动及影响的专著及论文, 缺乏对内地会在傈僳族当中的传教历史的详细叙述与分析。从上述博士、硕士论文来看, 多注重对傈僳族教会与信徒现状的田野考察及分析, 缺乏对傈僳族本色教会建立、发展历史的描写与分析。纵观目前的国内外研究, 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尚未涉及或言之不详细, 本书将对此重点展开阐释。

(一) 怒江傈僳族教会史研究

由于关注点不同或缺乏相关资料, 过往研究中多忽视傈僳族教会史的研究, 本书弥补了这一空白。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傈僳族教会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均承袭既往的做法, 故教会历史的梳理有助于当代教会的研究。

(二) 教会学校的种类与功能

傈僳族教会学校分为查经班、雨季圣经学校、儿童查经班等类型, 其中

尤以雨季圣经学校最为独特，这是教会神学教育处境化的直接表现。本书还以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考察了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与教会的关系。

（三）傈僳族教会本色化进程研究

教会的本色化研究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将详尽分析教会本色化的缘由、过程与结果，以及对当代教会的影响。

（四）基督教文化对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往对傈僳族文化变迁的研究当中，注重对变迁内容的考察，忽略了对变化成因与种类的分析，本书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内地会在傈僳族的传教活动中，傅能仁、杨思慧与杨志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关于内地会活动历史的论述，将以传教士作为划分章节的标准，以人述事，兼顾其他传教士。

内地会在傈僳族当中的活动地域，以怒江流域为主，傅能仁等传教士最早接触的是滇西南保山（腾冲、龙陵），潞西木城坡与耿马福音山一带的花傈僳，其后将基督教传至怒江峡谷的黑傈僳当中，故本书涉及的地域以当今怒江州为主，亦包括腾冲、保山、潞西、盈江等地。

关于传教士的译名，目前尚不统一，J. O. Fraser被译作傅能仁或富能仁，Allyn Cooke被译作杨思慧或杨智敬，Cooke夫人亦被田汝康译为杨思慧（*peak of faith*, 1993）。本书参照中文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并依照傈僳族学者史富相的译法以及里吾底当地信徒的说法，将上述两位传教士分别译为“傅能仁”和“杨思慧”。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内地会与怒江傈僳族概况	1
第一节 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概述 1	
一、内地会的创立、神学思想与组织特点 1	
二、内地会的本色化进程 4	
三、内地会在民族地区的活动 7	
第二节 怒江傈僳族概况 11	
一、族源 11	
二、语言 12	
三、20 世纪上半叶怒江傈僳族社会、经济、文化概况 13	
第二章 “傈僳族使徒”傅能仁与傈僳族教会的建立	16
第一节 傅能仁的早期活动 16	
一、来华前的预备 16	
二、在云南腾越、保山的传教活动 18	
三、傅能仁早期宣教不利的因素 22	
第二节 创制傈僳文、建立傈僳族教会 24	
一、缅甸浸礼会与内地会的合作 24	
二、腾越宣教事工的发展 25	
三、宣教重心的转移 29	

四、创制傈僳文字	33
五、傈僳族教会的进展	36
第三节 富有成效的传教方法	43
一、因地制宜的传教方式	43
二、坚持本色化原则	45
三、传教士的坚持与耐心	46
四、传教的成果	47
第三章 杨思慧夫妇的传教活动与圣经翻译	49
第一节 在云南潞西木城坡的传教	49
一、在龙陵地区的活动	49
二、木城坡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51
第二节 里吾底教会的发展	55
一、前往怒江上游的缘由	55
二、麻栗坪、里吾底的福音传播	58
第三节 傈僳文《新约》与全本《圣经》的翻译出版	63
一、傈僳文《圣经》的印制	63
二、傈僳文《圣经》的回顾	67
第四章 杨志英夫妇的传教活动与圣经学校	70
第一节 查经班与巡回布道	70
一、在云南的早期活动	72
二、在麻栗坪的传教	73
第二节 雨季圣经学校与教会教育的发展	75
一、雨季圣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76
二、女子圣经学校	83
三、青少年与儿童的圣经教育	85
四、麻栗坪教会学校	85

第三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教会的态度	88
一、国民政府对教会活动的抵制	90
二、国民政府视野下的边疆安全与教会	91
第四节 内地会撤离怒江地区	98
第五章 傈僳族教会本色化进程探析	100
第一节 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缘起	100
一、本色化传教策略的提出	101
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	102
第二节 傈僳族教会本色化进程	103
一、傈僳族教会本色化的由来	103
二、教会的自传：本土传道人的培养	105
三、教会的自主管理	110
四、教会的自养	114
第三节 与其他少数民族基督教会本色化的比较	120
第六章 20 世纪 50 年代怒江傈僳族教会	123
第一节 新政权对教会的改造	124
一、中央访问团的活动	125
二、新政权对教会的改造	126
第二节 50 年代怒江傈僳族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	128
一、50 年代教会的自传	128
二、50 年代教会的自治	129
三、50 年代教会的自养	130
第三节 50 年代新政权教会改造探析	132
第七章 当代怒江傈僳族教会	136
第一节 教会的恢复与发展	136

第二节 教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39
一、异端的出现与影响	139
二、境外教会的渗透与影响	141
第三节 当代傈僳族教会的社会功能	143
一、文字教育	143
二、民族文化遗产	144
三、社会交流	144
四、行为规范	145
第八章 基督教影响下的傈僳族文化变迁	146
第一节 傈僳族信教原因和特点分析	146
一、傈僳族信教原因分析	146
二、信教特点:群众运动	149
第二节 基督教对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151
一、对传统宗教的影响	152
二、对语言文字的影响	153
三、对姓名的影响	154
四、对婚俗的影响	155
五、对生活习俗的影响	156
六、对传统音乐的影响	157
第三节 “丢失的书卷”与文化挪用:文化互动的解读	159
一、“丢失的书卷”:以神话元素为表征的社会处境	159
二、文化的挪用:信仰变迁中的基督教影响	162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3

第一章

内地会与怒江傈僳族概况

内地会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于 1865 年创办。正如赖德烈 (K. S. Latourette)^① 所言, “从某些方面来看, 内地会的成立与发展是中国基督教宣教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篇章, 戴德生是历代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在 19 世纪因各种目的 (世俗的或宗教的) 来华的外国人当中, 因其宣教的成效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 4 至 5 位之一。”^② 作为拥有最多传教士人数的新教差会, 内地会派遣的传教士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 该会的神学思想、组织结构、传教士的培训等深深地刻下了戴德生的烙印, 办会的本色化策略对怒江傈僳族教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节 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概述

一、内地会的创立、神学思想与组织特点

经过在华几年时间的传教, 戴德生认识到基督教的传播发展面临许多棘

① 赖德烈, 传教士, 美国历史学者。他于 20 世纪初在中国传教, 兼从事教育活动。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西关系史, 侧重于在华基督教史, 其论著《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为基督教史学研究的著作。

②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 382.

手的问题。面对中国人数众多的民众，传教士的人数实在有限。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士全部住在几个通商口岸，广大内陆地区无人宣教。因此必须妥善安排传教士进入内地，处理差会行政事务并通过合理的财政制度，对传教士给予合理的支持。1865年春，戴德生夫妇合作写成了《中国：属灵的需要与呼求》（*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总结了几年的宣教，并表达了他对华宣教期望。最为重要的是，戴德生在书中提出了对华宣教的原则：

（一）任何具备合适资格的传教士候选人，不论宗派，只要拥有健全的基要真理信仰都会被接受。

（二）传教士要在生活所需上信靠上帝，差会并不保证任何收入，不借贷，只使用按时送来的专款。

（三）不接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劝捐。^①

以此作为宣教原则，戴德生于1865年夏与原中华传道会的皮尔士合作，在伦敦郡立银行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②（后文简称为内地会）的名义开设户头，存入10英镑，正式成立差会。

内地会的传教策略与组织结构的形成，深受戴德生的影响。作为一个跨宗派的宣教组织，它并没有一个严谨而综合的神学思想的表述，其基本教义纲领可归结为：（一）受圣经感动，（二）视圣经是最终、唯一的权威，基督徒的指南，（三）信三一（*Trinity*）的教义，（四）亚当堕落而引致全人类的沉沦，（五）凭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赎罪，（六）将来的回报与惩罚，（七）此生试验的限制^③。内地会的神学思想，是以“信靠上帝，一切凭信

① J. H. Taylor, *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p. 87. 所谓不劝捐的意思，即不以捐款为目的集会，不在布道集会上向听众募捐。如1866年戴德生在英国西岸巡回演讲时，曾有人在会在提议捐款，即被戴德生拒绝，称“不想会众受情感影响而捐款，希望日后若有意，可捐助任何去中国宣教的个人或团体，或寄交内地会办事处。”

② 内地会的名称是戴德生在朋友布迦的客厅中想出来的。参见徐欣娴，《全然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第80页。

③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386, n. 119. 赖德烈引自 Hulbert,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4, p. 256.

心做工”为中心的，费多（Klaus Fiedler）称之为“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这些神学观念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形成的。20 世纪以后，内地会的大多数传教士持有基要主义的神学观点，这与上述内容也是一脉相承的。

内地会在组织结构、人员选择、资金筹措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在华宣教的基督教新教差会，从形式上看，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差会，更像是一个“联邦似”的共同体，即由不同宗派、教会的传教士签署宣言加入，早期由戴德生领导，中后期由总部指导，各省监督管理的共同体。它具有以下七大特点：（一）以福音传播为主要任务。倡导深入中国内地，培训并借助中国同工传播福音。内地会特别强调福音传播，虽然内地会也从事了医疗、文字、学生等工作，但与其他差会相比，其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与直接传福音相关的。（二）内地会总部设立在中国，由在华传教士负责，并在时机成熟时交由中国本土同工领导。这样就可避免以前中华布道会因不了解国情而犯下的错误。其他诸如圣公会、长老会等多是由国外的董事会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内地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加快了本色化进程，教会的工作更多地交由中国教牧人员来管理。而在民族地区，特别是傈僳族、苗族地区，本土传道人从教会发展的早期开始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三）内地会招募的传教士只需接受过正统神学训练即可，内地会更看重传教士属灵的素质，而非牧师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内地会并没有规定传教士接受神学教育的学校名单，但 20 世纪以后，有许多传教士来自北美地区，而这些传教士毕业的学校，例如芝加哥圣经学院（Chicago Bible Institute）、多伦多圣经培训学校（The Toronto Bible Training School）都具有保守派神学的特点。来自不同宗派的传教士只需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成为内地会的传教士。不同背景的传教士以基督教基要原则为纽带共同合作，同时又保持了各宗派的特点，使得内地会具备了超宗派与国际性的结构特点。（四）采用“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的方式与其他差会合作，即一些来自欧洲或北美的差会自筹资金，名义上由内地会领导，资金由内地会上海总部管理，负责在华各个教区的传教。例如瑞华会（The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等，被归为“内地会系”的差会。（五）女性传教士在内地会的宣教工作中占据

重要地位。与其他差会很少派遣女传教士相比，内地会不仅将女传教士差派到内陆省份，西北甘肃、新疆与西南贵州、云南等地都包含在内。其中不乏冯贵珠（Evangeline Frances）、冯贵石（Francesca Law French）姐妹、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杨宓贵灵（Isobel Kuhn）^①等著名人物。（六）内地会不进行劝捐，不设收捐站，不公布捐献者名单。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与编号的收据。《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杂志创办后，内地会便将捐献、收支情况明细发布其上。差会并不对传教士的薪金收入做出保证，并且禁止负债。（七）注重传教的本色化。内地会传教士按规定均穿中国服装，用本土语言宣教，在中式房子内进行礼拜^②。

内地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直接源自戴德生在华几年时间的宣教经历。作为内地会的灵魂人物，从内部管理而言，戴德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在华亲自指挥宣教工作。英国本部则负责招募人员，处理财政，派遣传教士。这种模式在内地会发展早期提高了工作效率，发挥了较强的凝聚力作用。

二、内地会的本色化进程

内地会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如何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二是在20世纪如何有效地建立真正的本土教会。差会的本色化包含了传教士的本色化与差会组织的本色化两个层面。就传教士本身的改变而言，19世纪晚期内地会传教士所到之处，大多是风气未开的内地城乡，加之“疑洋排外”的情绪，造成宣教的种种困难。因此，在内地会本色化进程的初期，主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芥

① 冯氏姐妹与盖群英这三位女性在中国西北传教，杨宓贵灵在云南怒江傈僳族中传教。详见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China: Her Life and Her People*,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46; Valerie Griffiths, *The Ministry of Women i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20 ~ 1990* (unprint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8.

② Steer Roger, 梁元生译：《挚爱中华：戴德生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第22页。